

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

陳冠至*

【摘要】

書院藏書，是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類型之一，自唐末、五代迄清季，上下貫串，歷時千載，不但時空跨度大，影響層面亦廣。特別是明代江西書院的建設及藏書、刻書事業的發展都頗有建樹，號稱文獻之邦。然而，明代書院藏書的規模較諸當時的內府和私人藏書，顯得相形見絀。儘管如此，由於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仍然具有一些特色和創新之處，即便規模不大，卻很著重於實用、豐富等收藏目的，再加上講究日常的管理與維護，並重視編製藏書目錄等工作，綜合起來，對於明代整體藏書事業的促進、區域人才的培養、科舉及學術推廣等諸多方面的貢獻，都產生了許多不容忽視的歷史作用。對此，本文蒐羅史載有關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整體發展歷程，並以白鹿洞等本地書院作為主要觀察對象，除進行時空背景的剖析外，亦關注於藏書內容、管理、發展及歷史影響等諸多面向的探索，期盼能夠略窺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一些真實樣貌。

關鍵詞：藏書、江西、書院、明代

A Study on Book Collection Activities of Jiangxi Private Academies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Kuan-chih Chen*

【Abstract】

Collection of books in “academy”(書院) was one of the four main categori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collections, from the late Tang, Five Dynasties until the Qing Dynasty. Down throughout thousand years it influenced greatly and covered a wide range time span. However,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Ming academies is poorer than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in imperial storehouse and in private. Nevertheless, collection of books in Ming's academies still had many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s.

*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副教授

*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ew Taipei, Taiwan

Although book collection of academies were small-scale, but because of widesprea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focused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mphasized on daily management, catalogued books in academies, and so on, those caused the promotion and circulation of the library collection in academies in the Ming Dynasty. It also generated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area of personnel training, imperial career or academic promotion, etc. Particularly since Tang and Song, Jiangxi was known as the humanities town, and quite prestigious in construction of academies as well as library collection.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verall academy book collection development in Jiangxi of the Ming Dynasty, by the famous example of “Bailu academy”(白鹿洞書院), in addition to understand and explore the background, but also concerns about the collection's content, management, development, the historical role and influence, et al.

Keyword: book collection; Jiangxi; academy; Ming dynasty

一、前言

江西素負「物華天寶、人傑地靈」盛名，號稱「文章節義之邦」，特別是宋、明兩代乃至清朝乾嘉時期，江西尤為全國社會經濟與教育文化皆高度發達的地區之一，可謂文風斐然，人才濟濟，對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影響很大。所以，對於江西歷史人物的研究，不僅是研究歷史人物本身的問題而已，更是研究中國歷史、江西歷史，且進一步地有助於營造今日生活文化的一個重要命題。¹

江西地處偏隅，歷來戰禍較少，社會相對穩定，有利於發展文化事業。同時，自宋以來，江西即是造紙與雕版印刷的重鎮，尤其是廣信府於明代中期，造紙業的發展達到空前盛況，以轄下之玉山、鉛山、永豐、上饒等四縣所產製的紙張特別著名，甚至當時宮庭的用紙，大多是由這四縣的槽戶承造的。²基於如此，使得明代江西的私人藏書事業鼎沸盛極，成為江西古代藏書

¹ 陳榮華、陳柏泉、何友良，《江西歷代人物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前言，頁 1。

² 王安春，〈明代江西廣信府的造紙業〉，《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 4 期(2001.9)，頁 66。

史上的一段黃金時代，也是贛文化發展的輝煌時期。³

至於書院事業，自唐代以降，中國古代書院的發展即有官辦與私營之別，歷宋元而益發盛行，知名天下的書院相繼不斷地出現。明代建立後，太祖非常注重學校教育，以致當時中央與地方的各級學校莫不管理嚴格。當時中央的國子監，學生的待遇好，出路優，廣為士林推崇；而地方上府、州、縣的各級學校，也是如此。譬如江西的書院，從明初仁宗時期開始，便在地方官員們盡心奉行朝廷的興學政令下，逐漸復興了起來，不但使得當地仕紳與鄉民們紛紛響應，⁴也讓本地的書院帶有深厚的官方或公營色彩。

二、明代政治、文化背景對江西圖書事業發展的影響

明祚肇建，社會剛從大動亂中徐徐甦醒過來，太祖朱元璋(1368-1398)亟待恢復統治秩序，重建倫理綱常，以鞏固新的統治政體。他深信集儒家學說大成的程朱理學，對於維護封建綱常、鞏固集權統治、箝制萬民思想上，具有特殊的功效，於是力圖透過教育的手段，讓皇權思想深入人心。他認為學校不僅是官僚人才的養成所，也體認到教育對強化極權專制與封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遂全力促成各地教育事業的普及和發展。⁵元至正 16 年(1356)，時太祖甫攻下金陵，就先把當時集慶路的儒學改為國子學，以安撫知識份子。洪武 2 年(1369)，更通令全國各地都必須設立學校，諭曰：

朕惟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校，延師儒，授生徒，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⁶

當時除了南京有國子監外，太祖更將國學的精神與功能推行到全國，通令地方各級政府都要仿照京師國子監的規格來興辦地方學校。為了遵奉朝廷的旨令，許多宋元時期存留下來的私人書院，此時都被地方政府收編，改成官辦的儒學，使得書院與學校的概念十分混淆。例如江西廣信府弋陽縣儒學，據《嘉靖·廣信府志》載：

弋陽儒學，舊為「藍山書院」，宋季疊山先生謝君直(謝枋得，1226-1289)

³ 張來芳，〈江西古代藏書家〉，《中國典籍與文化》第 2 期(1999.5)，頁 23-25。

⁴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頁 272-286。

⁵ 萬明，〈朱元璋的教育思想與明初的教育發展〉，《安徽史學》第 4 期(1994.10)，頁 16。

⁶ (清)張廷玉，《明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卷六十九，〈選舉一·學校〉，頁 13 上。

所建；元張純仁讀書其中，後罹兵燹，書院遷於弋陽。國朝洪武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孝造士，書院遂改為今學也。……藏書有室而簡冊崇。⁷

當然，要辦學就離不開知識份子，更離不開圖書，這就使得太祖不得不同時也特別注重各地圖書事業的發展。⁸

另一方面，明初的江西文壇既承襲宋、元以來的理學緒餘，又受到當時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影響，於是產生了許多變化，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原本聲勢浩大的吳、越文人群體相繼走向落沒，反之典雅淳樸的江西文風，始引領全國的文學風氣，進而成為文壇上的主流勢力。⁹另一方面，透過明代人才的地理分布狀況，也可瞭解到江西士習與文化水準之高。先以《明史》各地區入傳人物的多少比例進行分析，一共收錄了 3,472 人的傳記；然後依傳主的籍貫區分，由多至寡依序為浙江、江蘇、江西三省，江西排名第三，共記載了 385 位。若再以《明儒學案》收錄的明代學術人才來看，江西更是高居第一，達 53 人之多。¹⁰由於江西地處長江中下游，獨特的地理環境和人文歷史，孕育出內涵豐富且具濃郁地方特色的江西文化，在明代更產生大批經由科舉入仕的江西文人，他們學識淵博，才華洋溢，形成明代江西文學人才濟濟的局面，¹¹其為官人數之眾，居全國之前列。¹²

當然，文學成就的卓越，自當與本地圖書事業的發達息息相關；而刻書的興盛與否，往往也是圖書事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與指標。擁有豐富原料與純熟技術的江西地區，刻書事業歷元至明，獲得高度的開發，於雕板工藝或裝幀等技術面上，都具有相當高的水準，成為江南刻書重鎮之一。例如萬曆年間，在南京享有盛名的刻書世家周氏和唐氏，其實都是從江西撫州府金谿縣遷往南京的，然後再利用南京的成功經驗，轉而推廣提昇回故鄉，在金谿縣和袁州府的宜春縣開設分號。由於周氏家族和唐氏家族在出版業的巨大影

⁷ (明)費案等，《嘉靖·廣信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5，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十一，〈書院·弋陽縣儒學〉，頁 17 下-18 上。

⁸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 2 期(1999.3)，頁 99。

⁹ 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學術研究》第 4 期(2005.4)，頁 141-145。

¹⁰ 陳國生，〈明代人物的地理分布研究〉，《學術研究》第 1 期(1998.1)，頁 55-58。

¹¹ 劉鳳、敖江彬，〈明代江西地域文化的特徵及其成因分析〉，《成功》第 9 期(2007.9)，頁 148。

¹² 曹國慶，〈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中國文化研究》第 4 期(1999.11)，頁 54。

響，透過他們於家鄉開設書坊分部的行為，除了帶回南京卓越的經營與生產技術，均衡城鄉差距外，同時更促進了在地刻書業的活絡。¹³總括地說，江西刻書事業實際上是起於宋而盛於明、清的，主要刻書地涵蓋六府，即南昌府、吉安府、撫州府、贛州府、廣信府、袁州府等處。¹⁴

綜上所述，由於明代政府積極辦理學校教育、區域文學社群領先全國，以及刻書事業發達等多重因素的交互影響下，使得明代江西的人才濟濟，名震天下。不過，經濟固然是社會發展的基礎，而經濟與人才之間，仍然需要教育、士習、學風等條件的配合，才足以推動區域性的文化特徵或風氣。¹⁵書院既然是明代江西人才的淵藪，因此，書院藏書所發揮的影響力，其重要性自當不可輕忽。

三、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發展特質

雖然中國古代書院與地方學校的教育功能類似，但是在書院的起源與最初的設立宗旨上，卻與歷朝統治者為教化百姓與推行科舉的目標有所不同，反倒是與私人藏書活動關係密切。書院的肇始，可追溯自漢代的「精舍」或「精廬」，當時為學者聚集生徒、私家講學的場所。只是不論「精舍」或「精廬」，受限於當時圖書生產技術水準較低，皆以口授手抄為課堂的進行方式，以致較不具備藏書的條件。至於「書院」這個名稱，實際上出現於唐代。隨著紙張的大量使用和雕版印刷術的發展，書籍數量越來越多，講學場所也必須建造較大的建築物來存放書籍，以利講者與學子們閱讀與論學之用，於是產生名符其實的「書院」。元代文人歐陽玄(1273-1357)曾經指出：

矧夫書院與學校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精舍於郊外，所謂「春夏讀書、秋冬射獵」者，即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賜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眡學校。¹⁶

可見書院的出現，實際是奠基於私人藏書活動的基礎之上。然而，在書院的

¹³文革紅，〈江西小說刊刻地—「雲林」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0.2)，頁218。

¹⁴王咨臣，〈江西最大的刻書作坊—潯陽書鋪街〉，《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1992.7)，頁74。

¹⁵胡兆量、黃恩涌、韓茂莉，〈中國人才地理特徵〉，《經濟地理》第1期(1998.3)，頁12-13。

¹⁶(清)趙之謙等，《光緒·江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4，臺北：華文書局，1967)，卷八十一，〈書院一·南昌府·貞文書院〉，頁10下。

發展歷程上，也因主辦者的不同，形成了官辦與私辦兩種類型。由於藏書是書院的重要內容和特徵，深深影響著古代的學術、文化與教育發展，因此，書院藏書，便成為中國古代藏書的一種重要型態，與官府藏書、私人藏書、寺院藏書並列，為中國古代藏書事業的四大支柱。書院既以擁書講學為務，無書即不成書院，所以，歷代書院都十分重視書藏的建置，皆以藏書充棟為目標，只是因環境和條件的不同，造成各家書院藏書規模產生差異。總之，書院藏書是書院教育成敗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而書院教育事業的興衰，也正與書院藏書事業的盛衰息息相關。¹⁷

一如唐宋，許多明代江西書院的起源，原本也都是為了藏書以供人閱讀。成化 21 年(1485)，撫州府知府周瑛(1430-1518)創辦「臨汝書院」，就是為了滿足自我的閱讀欲望。他說：「予初到官，嘗縮稍入為讀書屋於私第西南偏，既又為小屋以度書，及因地之窪而池之以滌筆硯，創畫多時，名號未備。至是，題讀書屋曰：『臨汝書院』，池曰：『浴雲池』，改小屋為『續騷亭』。」¹⁸周瑛雖然將讀書與藏書的場所分開，然觀其自述藏書是為了讀書，因此，藏書樓「續騷亭」自然是臨汝書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而臨汝書院的成立，自然也與藏書活動相輔共生。

到了嘉靖 12 年(1533)，又有南安府大庾縣的名宦劉節(1476-1555)，號梅國，官拜刑部侍郎，「疏乞致仕，詔從其請，年五十有八爾。公歸，立義館，延塾師以訓族；構書院，貯羣籍以授徒。」¹⁹這個書院，就是當地提學官陶某於劉節致仕歸里後為其建立，並以劉節之號為名，稱為「梅國書院」，由劉節負責管理。據《嘉靖·南安府志》載：

梅國，司寇劉先生別號也。書院在府治之西北，距城里許。嘉靖改元十有二年，先生致政家居，講學授徒，以斯文為己任。都憲南川陶公為創書院，以宗厥學。……先生治書院，尊道有堂，藏書有樓，我皇上所賜御製，及平生所有經史子集，與手所編輯諸書，以至老佛玄要、禪悟合理之言，各浩瀚充棟，可謂宏博矣！²⁰

¹⁷蕭東發、鍾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圖書館》第 1 期(2001.2)，頁 70-71。

¹⁸(明)黎喆等，《弘治·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7，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七，〈公署一·廨舍〉，頁 13 下。

¹⁹(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111，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四十六，黃佐〈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雪臺劉公節神道碑〉，頁 66 下。

²⁰(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0，上海：上海書店，

至於梅國書院的藏書樓，名為「御書樓」，在梅國書院，藏御賜及頒降諸書，并經史子集諸書。」²¹劉節曾經為「御書樓」編撰藏書目錄，將所藏分為：「御製」(15部)、「制類」(12部)、「經類」(56部)、「史類」(62部)、「子類」(30部)、「類書類」(39部)、「文類」(28部)、「奏議類」(6部)、「詩賦類」(45部)、「集類」(72部)、「字書類」(26部)、「志類」(67部)、「雜類」(42部)等十三類，一共包含了500部圖書，鮮少重複。若以部數多寡來看，由於「御製」與「制類」多為朝廷頒贈，故部數較少，其餘依序為「集類」、「志類」、「史類」、「經類」、「詩賦類」、「雜類」、「類書類」、「子類」、「文類」、「字書類」、「奏議類」。其中，以「集類」部數最多，即東漢末至明朝歷代諸儒的文集，且以明儒之文集居大宗。此外，僅「御製」類於每部之後載明卷書，其餘則標注部數而已，且序文過於簡略，以至分類不甚嚴謹，例如將《呂氏春秋》、《越絕》、《高麗圖經》等書，併入「雜類」等。雖然如此，仍可看出梅國書院的藏書之富，及其收藏特色。例如梅國書院收藏大量全國各地的方志，或是完全沒有說部書籍等。茲整理劉節所撰書目於文末附錄，以備讀者參考。

一般書院的藏書具有很強的共同性，表現在館藏上，便是以經史類典籍為重心；至於在根本上，也以通行本為大宗。²²然而，明代江西書院的藏書卻稍異於他省，表現出區域與時代風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藏書種類十分廣泛。由於江西自明初以來，在文壇上便保持著優良的區域文學傳統，加上理學興盛，故終明之世，一直以文獻德化而聞名天下，學術研究風氣特盛。誠如梅國書院便收藏很多的明儒文集與方志，顯現其不隨流俗，反樸歸真的區域藏書風格。時人湛若水(1466-1560)曾經作詩稱讚前述梅國書院的藏書之富，詩云：「樓外堂前沼引溪，樓中充棟青雲齊；半年恭默開群籍，學禮無寧但學詩。」²³而其中「學禮無寧但學詩」，即隱喻當時梅國書院不以科舉為進學修業的目標。

有別於當時全國的儒學生員群體多以追求科舉功名為要務，江西書院的學術研究性質則顯得突兀，成為地方辦學的一項特色，梅國書院便是一例。成化以後，坊間科舉用書的種類越來越多，除了四書五經講章和八股文選本外，也大量刊印古文選本、明文選本、翰林館課、類書、通史、諸子彙編、

1990)，卷十七，〈書院·梅國書院〉，頁24下。

²¹(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二十二，〈宮室·南安府·御書樓〉，頁5上。

²²蕭東發、鍾洪、王波，〈中國古代書院藏書概論〉，頁72-73。

²³(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17，〈書院·梅國書院〉，頁25上。

論表策試試墨彙編、範文選本等各式各樣的制舉用書，以滿足士子們全方位的備考需求。²⁴這類書籍專為應付科舉考試而作，或經節錄摘選，或為前輩程文，與原典的知識完整性相去甚遠，如：經書講義、經義文章寫作指導、通史節要、試墨彙編、古文選本、類書、韻書之類皆是。若由梅國書院的藏書內容來看，所藏多為原典；且「詩賦類」、「集類」、「字書類」、「志類」、「雜類」等 252 部圖書，也不是科舉考試的主要範圍，乃士子們於應舉之外，進行學習、研究、討論與參考的工具，竟然占了院藏圖書總部數的一半以上。所以，梅國書院的藏書裡頭，除了一般儒學普遍會收藏的科舉用書外，還包括為數更多的非科舉用書，提供師生們從事科舉以外的教學、研究與閱讀使用。

再如當時馳名天下的「白鹿洞書院」，雖屬官辦書院，卻也不以舉業為主要目的，反而是號召全國各地的有志之士前來江西就學，以論學問道為主。成化初年，時白鹿洞書院掌院洞主胡居仁(1434-1484)曾經修書給江西各地的官署衙門，要求選送俊秀人才入院就讀。由於書院重在學術研究，藏書的品質與多寡便顯得十分重要，所以胡居仁也希望官府能夠頒贈圖書給白鹿洞書院，作為教學使用。信中略云：

伏望廣行推訪有才氣英明、志向高遠及純篤溫厚者，訪得其人，命有司以禮敦送入洞，則士氣必振，海內風動，豪傑英偉之才，必不遠千里而至，作興之道，無過於此者。若夫凡下之才，「汲汲於奔競」者，不必招致也。況江右素號文盛之地，學校、科舉足以供主司之選，豈待興洞以教之哉！其間有意氣不群，敦厚好學，舉業已通，欲復求進乎古聖賢之域，以盡修己治人之道者，苟非興洞，何以聚而教之哉？……洞中全無書籍，更望即求入洞，以賜肄習。²⁵

到了弘治年間，江西提學副使邵寶(1460-1527)也曾經向全國發出通告，期盼招徠各地「暫輟進取而志於學者」，入白鹿洞書院研讀，榜云：

謹案南康府白鹿洞書院，實據匡廬、彭蠡之勝，宋儒周、朱二先生嘗游寓焉。其秀自天，可以資靜修之趣；其重因人，可以興景仰之思。士惟無志，苟志欲上師聖賢，進德修業，期有益於天下者，聞茲洞院，

²⁴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2009.3)，頁 155。

²⁵(明)鄭廷鵠，《白鹿洞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十一，胡居仁〈奉祀參政鍾憲副莊僉憲〉，頁 309。

皆當負笈裹糧，從事於斯。況有舍以居，有田以贍，有書以觀如今日者，而可不游乎！……今學校徧天下，立貢設科，教且用之，具有成法。若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眾，而所習者仍與眾同，……凡我學校諸生，暨山林儒士，有清修慎篤，欲「暫輟進取」而志於前所謂學者，許各府、縣起送前來。寶雖寡陋，敬遵先儒舊規，斟酌程課，近臨几席，遠寓筆札，相與講明焉。……所謂「暫輟進取」，或五六年，或七八年，必待學成，然後出用，不惟其言，惟其事實，斯為有志之士。如或立志未定，請勿輕至。其四方學者，聞而來游，當異館待之。²⁶

由上可見，明代江西白鹿洞書院的學生，是經過天下各府州縣篩選過當地的優秀儒學生員或知名文人，且為了避免與地方儒學專以考取科舉的教育目標相同，讓人有「舍彼就此，徒欲自異於眾，而所習者仍與眾同」之譏，故白鹿洞書院專門吸收各地短期內不打算參加科舉考試，僅立志於鑽研學問的優秀學者們，選送到書院內就讀，並發給各項生活津貼，稱為「廩餼」。

明代江西的書院繁多，書院中又講會林立，呈現一片學風鼎盛的景象。當然，在科舉盛行的明代，書院生員們所學習的知識，自不可能與科舉毫無關係。而那些奔走於書院與儒學之間從事教學的教師們，也無法將講學與舉業的知識做到嚴格的區分。²⁷不過，由於明代江西書院的學術研究性質比儒學來得高，因此，在藏書事業上，兩者亦有明顯之不同。一般而言，書院藏書的學術性會比較明顯，內容沒有太多限制；而儒學藏書則受官方控制，種類較少，多半是一些有關人心教化或與科舉相關的朝廷賜書。²⁸值得注意的是明代書院的藏書內容，有時還會反映出區域學術潮流的變化，或是該書院的治學特色。²⁹而相同的是，兩者都能滿足師生閱讀和研究查檢的需要，甚至還可提供當地或各地的讀書人使用，可說是古代最為開放的兩種藏書類型。³⁰

在書院學風的薰陶下，歷代學子們刻苦攻讀，廣及儒家經典、歷代詩文、

²⁶(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五，邵寶〈白鹿洞論來學文〉，頁76。

²⁷胡定鴻，《明代江西書院與科舉互動關係研究》(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8)，頁25-26。

²⁸陳冠至，〈明代江西地方官府藏書事業研究--以各級儒學為考察中心〉，《圖書資訊學刊》第13卷第2期(2015.12)，頁51-52。

²⁹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高校圖書館工作》第4期(2001.8)，頁51。

³⁰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第3期(2003.8)，頁20。

筆記、書法，乃至宗教典籍等。書院造就了眾多學者和人才，在傳播文明、繼承文化傳統等方面，確實發揮了重大的教育作用。³¹此外，由於書院主要是為了傳播知識，幫助學習，所以在藏書的板本上，並不會刻意去追求舊刻珍槧，所重唯大眾化的通行本而已，如此既為書院財力所允許，也可滿足師生之所需。同時，書院不僅購書、藏書，同時也抄書、刻書，讓書籍在社會上廣泛流通，不但成為本地藏書豐富之處，也易形成地方上的文化中心。同時，書院藏書也保存了許多的珍貴古籍與文獻，使其得以流傳到今天。當然，透過閱讀書院的藏書，讓很多明代江西的生員因而出類拔萃，成為日後國家的精英人才。³²

四、明代江西書院藏書徵集的來源

由於書院是士人圍繞著書而開展教學、研究活動的重要文化組織，所以書院與圖書，兩者彷彿具有血緣般的親屬關係。自古以來，書院便以藏書作為主要的經營項目之一，如何徵集到更加完備的藏書質量，一直是院方首要關心的課題。一般而言，歷代書院收集圖書的管道，不外乎透過朝廷頒賜、官府添購、社會捐助、書院自籌等幾種途徑。³³

明代江西書院藏書質量的豐富，往往就是憑藉其徵集來源十分廣泛。如同地方上的其他官府藏書機制，朝廷的贈賜、書院自行購置、自行刻書、籌款募捐等，都是明代江西書院添置或補充藏書的途徑。³⁴

(一) 朝廷的賜書制度

明代中央政府經常刻印許多有關教化百姓，或是利於封建專制極權統治的圖書，並頒贈天下。太祖時期，中央政府的刻書活動主要是由南京國子監負責；自成祖遷都北京以後，便改由內府的司禮監主持，其下設經廠，專司刻書。刻印的內容是以推行文治政教為主，包括：典章制度、史籍、佛藏、道藏、番藏、鑒戒等書，主要作為宮內學習、頒賜群臣和各地學校等用途，為官府藏書的重要來源。終明之世，內府的經廠與南、北國子監，就是明代中

³¹朱黎明，〈略論中國藏書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江西圖書館學刊》第 4 期(2004.12)，頁 83。

³²蔡儀、蔡小初，〈書院藏書談〉，《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2002.2)，頁 85。

³³舒原、余峰，〈中國書院的圖書徵集制度〉，《湖南大學學報》第 1 期(1998.2)，頁 32。

³⁴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圖書館建設》第 1 期(1995.1)，頁 69。

央政府主要的三大刻書中心。此外，在京的各部衙門，以及地方上的藩府和各級行政機關，也經常從事刻印圖書的工作，都屬於明代的官方刻書系統。³⁵

為了教化天下、鞏固帝國統治，明朝的皇帝經常會頒贈典籍給各地宗藩與朝臣們，還有各地的學校或書院，³⁶以達成約束天下臣民的目的。譬如：

太祖高皇帝統有萬方，即令天下脩明學政，以圖化理。……學堂扁曰：「明倫」，敦化本也。教以四書五經，皆以發明此義而已。……太宗文皇帝，又恐學者迷於所適，乃召諸大臣，博採先儒論說，輯為《四書》、《五經》大全；又採濂洛關閩諸君子著述，輯為《性理大全》。宣宗章皇帝復類輯經書格言，及歷代帝王并本朝祖宗之善行，著《五倫書》。皆頒布學校，以為典訓。³⁷

尤其是南、北兩京的國子監，例有刻印書籍頒贈全國各地學校的成規。明末浙江金華藏書家胡應麟(1551-1602)曾經指出：「經則一十三家注疏，史則二十一代，類頒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³⁸

至於明代江西書院獲得官府頒贈圖書的情況，以白鹿洞書院為例，據萬曆年間的盤點紀錄，當時朝廷頒賜的書籍存在的計有：「《大明律》一本、《存心錄》五本、《洪武正韻》五本、《孝順事實》二本、《大明一統志》二十四本、《大明會典》五十本、《明倫大典》十二本。」³⁹此外，還有由朝廷臨時委派的中央官員贈送書籍給江西書院的例子，再據《白鹿洞書院志》記載：「萬曆癸卯(31年，1603)夏，蒙按院吳發書貳部：《諸儒語要》四本、《訓士錄》十本。」⁴⁰按院即巡按御史的別稱，當時曾有一位吳姓的巡按御史贈送書籍給白鹿洞書院。一般而言，官府置備也是書院藏書的主要來源之一，通常透過兩種方式：一是奉文置書，即上級衙門撥發官帑命令下級官員購置；二是地方政府在其權力範圍內動用公款為轄內書院置書，這是明代江西地方官府為書院置備書籍的主要形式。⁴¹

³⁵何東紅、朱賽虹，《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頁135-143。

³⁶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1996.3)，頁107。

³⁷(明)黃文鸞等，《正德·新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6，上海：上海書店，1990)，卷六，〈學校〉，頁7上-下。

³⁸(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卷四，〈甲部·經籍會通四〉，頁53。

³⁹(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三，〈人物志·國朝十三人·聖製〉，頁510。

⁴⁰(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卷三，〈人物志·國朝十三人〉，頁512。

⁴¹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50。

(二)書院自行購置

中國古代的書院藏書由書院自行籌措者，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由書院斥資購置，一是自行刊刻，其中又以前者為多。嘉靖 43 年，白鹿洞書院洞主陳汝簡曾經說過：「汝簡訪聞先時書籍，洞租買置居多。」⁴²可見明代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主要是來自於透過本身的經費購買。基於十分有限的洞租，為了保證最基本的教學需求，書院自籌普遍遵循著一個原則，就是「有用」，也就是說，採訪政策是以符合最基本的教學與研究需求為標準，只要缺少什麼，就設法補充什麼。⁴³明代書院以經史為主要藏書內容，其次為陸王學派學者的文集、語錄等，以保證最基本的教學內容。⁴⁴

此外，書院洞主也經常會主動向人勸募書籍或金錢，以充院藏或購書之資。例如前述成化初年的白鹿洞書院洞主胡居仁，便曾經寫信向友人要求寄書入洞，略云：「洞中少書籍，望廣求人洞，以嘉惠後學，幸甚！昔朱子雖升去浙東提點，猶拳拳於此，遺錢命後人興理。先生之心亦然，故以為請。」⁴⁵

(三)書院的刻書活動

至於明代書院所刻的圖書，以現存者來看，包括了經史子集各類的教材或參考讀物，以及師生學術新著和有關書院的文獻等。其中對於書院的修志、刊志，明人則顯得特別重視。此外，對於叢書的編纂刊印，明代書院也開風氣之先，影響及於後世，奠定了清代發展的基礎。⁴⁶

以白鹿洞書院為例，有明一代，其刻書事業可謂相當繁盛。據嘉靖 4 年(1525)的統計，時白鹿洞書院所藏雕板計有：「《易經》板五十九片，《書經》板五十參片，《詩經》板九十參片，《春秋》板六十捌片，《禮記》板壹百九十九片，以上俱提學副使邵寶刻。《白鹿洞書院新志》板捌十七片，提學副使李夢陽(1472-1529)刻。《五禮圖》板五片，提學僉事田汝籽(1478-1533)刻。《遵道錄》壹百零壹片，僉事王崇慶(1484-1565)刻。《史記》板二千片，汝籽刻，見寄貯南昌學。《重修白鹿洞書院新志》板一百零三片，提學副使周廣(1474-1531)刻。」⁴⁷可惜的是，明代白鹿洞書院所刻之圖書，傳至今已幾乎

⁴²(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

⁴³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 51。

⁴⁴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1 期(1997.2)，頁 5-6。

⁴⁵(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卷七，〈文志·寄周時可〉，頁 606。

⁴⁶蔡儀、蔡小初，〈書院藏書談〉，頁 84。

⁴⁷(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八，〈書籍志第十三·鏤板〉，頁 145。

散佚殆盡，無從考見。⁴⁸

明代江西書院藏書事業的發達，其實與理學的興盛具有很大的關聯性。理學家們所推崇的四書、五經，以及理學家解釋和闡揚儒家經典的論著，都成為當時江西書院通用的基礎教材，自然也是書院的重點藏書。刻書是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之一，所以院裡從事教學的名師與學者們，對於上述基本教材與經典的刊刻活動，往往都會親自主持。此外，明代江西書院還刊刻了許多名師碩儒的著作，以及院內師生們的教學與研究成果，陳列於院內的藏書樓裡，提供借閱流通，為生員們的日常讀物，對書院的教學和研究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力。至於刻書費用，主要來自於洞租、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資助，以及官員或紳民的私人捐贈等途徑。一般而言，書院自行刊刻的圖書，例皆典藏於院中，作為師生誦習之具；⁴⁹不過，書院刻書有時也對外販售，其獲利可用來補充日常經費的不足。⁵⁰

(四)私人捐贈或寄存

社會捐贈，也是書院藏書的重要來源。社會捐贈所得之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內容廣泛，豐富多樣，反映了最新學術成果。這是由捐書者的社會地位、學術水準、政治主張等不同因素造成的，也就是說，志趣各異的各類學者團體，必定會將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者最能反映其學術特色的出版物捐給書院。⁵¹

嘉靖時期，權相嚴嵩(1480-1567)曾經在其故鄉江西袁州府分宜縣創立了一所書院，並捐贈院中的所有藏書。時人張自烈(1597-1673)指稱：

世廟中，分宜嚴相國嵩為「鈐麓書院」，祀先聖「止善堂」，無藏書。先是，嵩官大宗伯，斂書送學。考邑志，所送四書、五經、《性理通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劉向《說苑》、《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為善陰騭》、《明倫大典》、《義永武安王集》而止。⁵²

⁴⁸趙連穩，《中國書院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頁164-165。

⁴⁹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頁5-6。

⁵⁰陸漢榮、曹曉帆，〈古代書院藏書重要來源之一：書院刻書〉，頁69-70。

⁵¹羅立、羅曉鳴，〈古代書院的藏書制度〉，頁50。

⁵²(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叢書集成續編》1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卷十八，〈芑山藏書記〉，頁6上-下。

作為明代江西書院藏書建置來源的一種途徑，社會捐助，通常包括了官紳士民的個人捐贈、書院師生的捐置、非官方機構之贈送等三種主要形式。一般說來，是由主持創建或修復書院的地方行政長官，包括總督、巡撫、知府、知州、知縣，也有督導地方教育事業的提學官，他們各自單獨捐俸購置書院的圖書，這種情況在明代江西非常普遍，且其所捐之書，往往就成為某一書院藏書的唯一來源，這是官員個人獨力捐助的情況。有些捐書者原本就愛好收藏書籍，甚至是藏書家，後來為了澤惠後人鄉鄰，才將藏書捐贈或寄存書院的。

至於社會捐助所得之書，有一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內容廣泛，豐富多樣，且反映出最新的學術成果。這一個特點，經常因為捐書者的社會地位、學術水準、政治主張、志趣愛好等因素，而各不相同，也會因為受捐書院所在地的文化需求、院中生員程度高下不一，而造成許多差異。若為藏書家所捐，往往會摻雜許多精刻善本，這一類書籍原本即具有私人藏書的許多特性，復轉為公用，便同時兼具書院藏書的開放性，使得院藏圖書的版本層次大為提高。

總之，社會捐助使得書院藏書，在內容上具有廣博豐富、類別多樣的特點，為書院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提供了廣泛而堅實的文獻支援基礎。同時，也在學術研究上，輸入新的研究成果，為活躍院中諸生的思想，促進學術水準，提供了重要的保證。而在圖書的板本上，社會捐助更具有融入私人藏書的特點，讓書院藏書從公用與大眾性質，進而成為精品、善本，為書院提高知識服務層次，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⁵³

五、明代江西書院藏書的典藏、管理與利用--以白鹿洞書院為例

書院教師的講學以講書為主，而生員的學習鑽研，更是以讀書為要。因此，書院對於書籍的徵集、整理和借閱管理等工作，是不容忽視的。⁵⁴有別於官府和私人藏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書院藏書的「公共性」和「開放性」，其收藏目的並不在於為藏而藏，也不在於獨自覽閱，更不在於販鬻得利，而是為了供人借讀、研習與日常講誦之用。因此，它沒有深藏篋笥、終飽蟬蠹之弊，卻具有「最大限度開放流通」與「保護圖書」的永恆矛盾。⁵⁵所以，制

⁵³鄧洪波，〈簡論中國書院藏書的五個來源〉，頁 4-5。

⁵⁴鄭飛，《明清江西書院學規初探》(南昌：江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院碩士論文，2007)，頁 46。

⁵⁵鄧洪波，〈中國書院藏書的借閱制度〉，《江蘇圖書館學報》第 4 期(1998.8)，頁 15。

定妥善的管理辦法，就顯得格外地重要。⁵⁶

(一)藏書管理人員的設置

書院自唐代出現以後，便與藏書活動緊密相聯，歷經千餘年的發展，形成許多獨具特色的管理制度，包括徵集、整理、編目、保管、借閱等在內的制度和管理體系。歷代書院藏書的管理人員，有：司書、司書吏、掌書、典書、書役、司事、書辦、院書、號房、看役、看守、門子、庫子，或是兼管之齋長、管幹、學長、監院、山長、首事、洞主、洞長、教授、教官……等稱謂。⁵⁷

明代白鹿洞書院座落於江西省南康府星子縣內。白鹿洞書院創始於唐代，歷元末兵燹，逐漸毀損荒蕪。明興，經南康府知府翟溥福(1381-1450)重修後，始克復學。《白鹿洞志》載：

書院基于李氏，……至元經兵燹，殿宇、書籍不能無毀焉。洪惟我朝，德盛化洽，文教邁古。自郡守翟公(翟溥福)建學以來，洪儒碩輔，每有增置書籍，歲時積累，經史子集，漸以克備，誠足為師友講習之資。⁵⁸

然而，明初白鹿洞書院的員額編制並不健全，正德以前，未設專人負責管理日常院務。一般說來，除了府縣主官(管)以外，省級的布政使、按察副使或僉事(提學官)，乃至朝廷委派之撫、按等御史官員，對於白鹿洞書院，原則上都具有管理與督導之權。例如成化初年的江西提學官李齡(1406-?)，便曾為白鹿洞書院擬訂「禁約」，申明院內的圖書管理辦法，大致為：

今後仰府設立一樣冊籍四本，明開書籍什器，解赴本道鈐印，印過一留本道存照，一留本府存照，一發本府學存照，一發付書院「庫子」收管。本洞教授，每月朔查取門庫損失有無執結，歲終仍申本道查考。⁵⁹

約同其時，明代的首任洞主是由餘干縣的知名學者胡居仁擔任，然其後洞主又時設時廢，未設專職。正德末，巡按江西監御史唐龍(1477-1546)始上奏朝廷，請置專官管理洞務，首開朝廷部議白鹿書院洞主之例，足證當時白鹿洞書院的名聲已是傾動天下。《白鹿書院志》載其事云：

⁵⁶關於中國古代書院的藏書典藏管理與流通制度，可參見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一書。

⁵⁷鄧洪波，〈試論書院藏書的管理體系〉，《圖書館理論與實踐》第3期(1996.8)，頁44-46。

⁵⁸(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317。

⁵⁹(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續修四庫全書》7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卷十，〈藝文·巡撫邵銳依提學道所擬禁約〉，頁4下-5上。

唐龍，字虞佐，蘭溪人，江西巡按御史。正德庚辰(15年，1520)按南昌，首詣書院，謁先聖畢，訪查書籍、田畝，無官綜理。奏起原任興化府教授蔡宗袞以為南康府教授，專主洞事。事下部議，從之。明興，未有以白鹿洞主為請者，茲異數也。……蔡宗袞，字希淵，山陰人。由進士授興化府學教授，踰年而歸。正德庚辰，御史唐龍上疏，起為白鹿洞主，乃授南康府學教授，主白鹿洞。敦復洞規，士風丕變。⁶⁰

再考唐龍原奏，略云：

臣近日巡歷本府，首詣書院，展拜先聖先賢。見得祠殿荒涼，門廡零落，往來皆牛羊之跡，前後俱蔬稼之圃。及訪書籍，已多散亡，田畝亦浸遺失。詢厥所由，蓋因無官綜理，每年止是本府星子縣編僉「門子」二名，輪流看管，以致狼狽至此。夫必欲設官，尤恐費事，緣本府儒學距書院僅十五里，但得一學行教授兼管，即足矣。……臣訪得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袞，由進士出身，學問深該、志行清古。……如蒙乞敕立部查議，將蔡宗袞改調南康府教授，不妨原務，兼總理書院，用修遺教。……以後員缺，常於進士內慎選銓補。⁶¹

綜上所述，可知白鹿洞書院自明初至正德末，除了成化初年胡居仁曾任洞主外，沒有專員管理。因位在南康府星子縣的轄境內，主管機關為南康府與星子縣，故僅由星子縣派遣二名「門子」，輪流看管日常雜務，如此簡陋的編制，自然導致藏書散亡、學田浸失。當時唐龍建議設置專員管理，由南康府儒學當中，擇一進士出身之教授，兼理白鹿洞書院的全部院務與日常營運。

正德 16 年(1521)，朝廷接受唐龍的建議，下令授予蔡宗袞南康府學教授，支正八品俸級，令其到任而不妨原職，綜理白鹿洞書院的一應事務，同時規定爾後員缺，仍應慎擇儒學教官兼管書院，但不限於南康府學，以為常制。從此以後，白鹿洞書院的藏書便有專人負責管理，「凡各部書籍見在、殘失數目，蔡宗袞俱已查對明白，裝造四冊，申解提學道討取鈐印，一留本道，一發本治，一發本學，一給付本洞『庫子』。」⁶²也就是說，蔡宗袞到任後，即依照先前提學官李齡的規定，首先清點當時書院內的現存書籍，然後編製書目清單一式 4 冊，呈交提學官(江西按察副使或僉事)蓋印後，即分送提學官、南康府、南康府儒學、白鹿洞書院等四處留存備查。至於當時書院內書庫的

⁶⁰(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四，〈先獻〉，頁 65 下-66 上。

⁶¹(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四，〈起蔡宗袞為白鹿洞主劄付〉，頁 53-54。

⁶²(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卷八，〈書籍志第十三〉，頁 143。

日常實際管理者，則是「門子」與「庫子」。

嘉靖年間，白鹿洞書院的員額編制又有些微調整。仍設洞主一名，掌理洞務，選擇學養優良且負時望之文士為之，多以儒學教官或南康府官員充之；另置教官二人，職掌教學與設備查管。萬曆、天啟時期，南康府知府袁懋貞曾說：「往例督洞教官二員，亦每年共給銀十二兩，茲欲訪問餽之遺，難同苜蓿之儉。議加一倍，每年支洞租銀二十四兩，送本廳自備往洞之需。至分督教官，勞逸應均。」⁶³至此，白鹿洞書院的藏書管理人員，除了洞主與「門子」、「庫子」外，又多了二位教官。

(二)藏書的典藏、管理與維護

為了處理藏書的日常維護與修補問題，以及防止書籍因人為因素而散失毀損，自成化初年開始，白鹿洞書院便實行過許多相關的辦法與措施。弘治年間，江西提學副使邵寶曾經延聘飽學之士入洞校勘圖書，以維持院內藏書的品質。《同治·永新縣志》載：

尹爽，字用晦。年十七，忽自奮曰：「不學，何名為人！」閉戶深研易理，泛及諸史百家。督學邵文莊(邵寶)見所試文，稱為國士，命校白鹿書院經籍。⁶⁴

到了嘉靖初年，巡撫江西都御史邵銳(1480-1534)復因江西舉辦科舉考試，導致白鹿洞書院的藏書受到損壞或散失不全，於是下令：

一本洞儲書，專以教迪士類。近年江西科場，必取洞書應用，及至領回，缺者不敢言缺，失者不敢言失，洞書殘落，大半由此。今後江西科場書籍，布政司自備，該府毋得輒取鹿洞書籍送用，以致遺失。⁶⁵

然而，後來邵銳的規定並未被貫徹執行，直到嘉靖 43 年(1564)時，白鹿洞書院仍然受到江西科舉借書之害，院內藏書因而損壞散佚的情況沒有獲得改善。於是，當時的洞主陳汝簡又續添了一些新的措施，制定書籍的修補、借閱與編製書目等許多辦法，來杜絕弊端。陳汝簡說：

如近時貢院之弊，取有常文，歸不完璧，其散亡也，不亦宜乎！茲立補輟之法，屬取借之禁，尚恐後之君子無所稽考。……近得青厓胡公親送《初學記》等三書入洞，迨篁溪鄭公(鄭廷鵠，1505-1563)修志之

⁶³(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十，〈藝文·知府袁懋貞申請洞主文〉，頁 15 下。

⁶⁴(清)蕭玉春等，《同治·永新縣志》(臺北：江西永新旅台同鄉文獻委員會，1976)，卷十七，〈儒行·尹爽〉，頁 3 上。

⁶⁵(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十，〈藝文·巡撫邵銳依提學道所擬禁約〉，頁 4 下。

時，俱已亡矣！彼議欲立增置「書籍」一門，備見何書係何年收買，或何人發送，俾人所由來，而不忍遽至於散失也。為懼侵梓煩瑣，乃於經部之末，分註新增書籍，惟深致慨惜丁寧之意而已。自時厥後，不數年間，右文諸公有事茲邦者，發到書籍，已不啻數十百本，謂之無所觀感而然者不可也。茲仿鄭公成法，備查胡公以後，凡有增置書本，悉照原來年月開載，仍為詳考經、史、子集，類附登志。尚冀獲瞻是卷者，知洞學之書，人得而增之，而分散竊取者，或亦知所愧怍，悉為復還，不使部帙之殘缺也。如是，則積累以漸，數年之後，白鹿經史，又奚但汗牛充棟已耶！⁶⁶

當時還頒布了《整書事宜》，明訂：「修整書籍，每五年一大修，三年一小修。南康府呈委主洞教官，慎選博識謹篤洞生四名，查理損壞書籍若干本，動支洞租，招募書匠逐一修整。」⁶⁷

從此以後，白鹿洞書院藏書的保存與管理便日趨嚴格與健全，不但歷經多次的增補修繕，也編製了詳細的書目，且將新進的圖書隨到隨記，又於平時派遣專人負責查檢書籍狀況，洞主隨時督導抽查。此外，在新舊洞主交接時，必須完成點交，並造「交盤簿」，清楚記載書籍的來源、數量與現況，以利接管。嘉靖 45 年(1566)，洞主李資元指出：

夫洞學接管，必有盤交，慎職守也。交盤必有冊，詳紀載也。紀載維何？書籍、祭器爾已。……但慎守者束之高閣，慢藏者則散佚不收，無怪乎道不明而禮不飭，徒為虛文虛器爾已。……余繼提舉洞事，通將經史子集類分先後，以聖製列于經部之先，志書附于史部之後。附子部者，諸子之創作也；附集部者，諸子之新選也。已經整修者，序列于前；未經整修者，附列于後，條具分明，總計壹百柒拾貳部，發予「門庫四役」，照數收藏看守。凡于四季，遇濕氣則加曝曬，有塵垢則加展拂，照類收拾，使經久不壞。……洞主講論之暇，時加檢查，則不啻載道有公器，而明道之功益不輟矣，夫豈有高束、慢藏者哉！……今查自貳拾參年(1544)以後，增入授受、某時某公、其書其數，皆有可紀，批閱講論，亦知所自來矣。⁶⁸

根據李資元的敘述，可知當時白鹿洞書院的實際管理員有「門子」2 人與「庫

⁶⁶(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

⁶⁷(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六，〈經籍〉，頁 427-428。

⁶⁸(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 317-318。

子」2人，共計4人，負責日常的典藏、維護、流通出納與管理工作，且得隨時視書籍的典藏狀況，進行曝曬、清潔等保護措施，使得藏書達到172部之多。同時，每部書都詳細紀錄其冊數、收受來源、典藏脈絡等資訊，提供日後之追查、參考與評價。

(三)藏書的使用與流通

書院的藏書提供院內的教官、學者與生徒們之教學與閱讀使用，是中國古代書院制度形成以來相沿成習的一項傳統。至於學術文化，乃指最狹義的文化內容，包括文學藝術、科學技術、區域居民的教育狀況與文化素養，以及各類文化人才和文化成果等。由於各地的人文和自然環境的不同，學術文化總是呈現出鮮明的特徵。⁶⁹就明代而言，由於理學的昌盛，使得江西書院的學術性藏書比一般儒學藏書豐富很多，因此，對於區域學術研究的推廣，書院藏書的影響力實在不容忽視。

嘉靖45年，白鹿洞書院洞主李資元曾經指出當時院內藏書總計有172部，且是由稱為「門庫」等4位差役，謹慎小心的收藏保管。一般而言，「門庫」是院內書籍的實際管理員，分為「庫子」與「門子」。當時白鹿洞書院規定：

「庫子」二名，每年星子支租參拾貳石，僱募鄰洞居民充當；「門子」二名，每年星子縣均徭編派，親自充當，年終交替。門庫不許擅離書院，致有器物損失；師生亦不得分外虐使。⁷⁰

不過，「庫子」是聘僱人員，屬於官府之屬吏，為志願職，故其在職時間可以較長；而「門子」則是由星子縣轄下的百姓輪役充任，每年更換，為義務職，在職時間理論上會比較短。如此看來，「庫子」應該才是書院內藏書樓主要的專門管理人員，「門子」僅負責「看守本洞諸件，供給香燈，灑掃，并夜晚提鈴以謹火燭，不許諸生擅自役使借辦。」⁷¹然即便如此，「庫子」與「門子」仍需共同看管書樓與藏書，二者都得辦理圖書的典藏、出納與流通等業務。至於當時書院內的圖書使用規則，仍需按照一定的流程，大致為「在洞肄業諸生，凡有考究必須取書。取時書書名于門庫，覽畢，則門庫持帖類收。洞主講論之暇，時加檢查。」⁷²也就是說，讀者欲借書時，必須先向「庫子」與「門子」登記，填妥借閱日期、書名和借閱者等資料後，才准借閱；等到閱

⁶⁹編委會，〈歷代才俊出何方〉，《科學中國人》第7期(2001.7)，頁39。

⁷⁰(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八，〈洞學田下·給贍〉，頁464。

⁷¹(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二，〈李齡規示諸生八事〉，頁324。

⁷²(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一，〈主洞李資元白鹿洞學交盤冊序〉，頁317。

覽完畢後，再由「庫子」與「門子」依書籍借閱登錄回收，然後分類歸架。總之，除由「庫子」與「門子」負責書院內書籍日常的典藏、維護、借閱與歸還等工作外，「門子」還需負責保持藏書樓內的燈光照明、環境的整潔與安全防護等事宜；而洞主則負最終督導之責。

為了使讀者養成尊經重道、愛護典籍、學而有序的讀書習慣，白鹿洞書院制定了許多嚴格的閱覽規則。例如要求師生們觀書，必須保持身體整齊清潔，尤其嚴禁諸生有「如小衣入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等「侮慢聖賢」之行為，⁷³違者將受到懲處。此外，生員們也被要求必須按照一定的科目順序來進行閱讀，不可逾越脫序，於是規定生員們「讀書必循序，不可躐等。先讀《小學》，次讀《四書》、《五經》，及御製書、史鑑，各隨資質高下。」⁷⁴

六、結論

明代全國書院最多的省份便是江西，而藏書和刻書是書院的重要文化貢獻，為了提供學子們鑽研，書院大量地蒐集圖書與雕板，加以珍藏，以備教學使用。圖書的來源主要有：皇帝賜書、地方官府籌置、書院自籌購書，以及社會捐贈(地方官員、鄉紳、士民以個人身份捐贈)等途徑。另一方面，書院往往也會自行刻印圖書，有時還必須承擔地方官府刻書的部份任務，尤其是參與刊印地方文獻和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詩文集等工作。⁷⁵

閱讀活動是一種社會現象，而且這種社會現象往往表現出明顯的地域文化特點。所謂地域文化特點，就是指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差異。明代的地方閱讀風氣，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文化特點。一地由於文化教育事業的發達、重教尚讀風氣之濃厚，以及藏書與出版業之發達、文人學者之輩出、文獻著述之繁富等現象，皆為影響一地閱讀風氣盛衰的主要因素。而閱讀活動的興衰，不僅引領和促進著整個明代的讀書風氣和學術文化的發展，也對後世產生重要的影響。⁷⁶

若與歷代的中央政府藏書或大多數的私家藏書相比，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旨在推廣地方教育與學術發展，凡是院內的學者或生徒，都能借閱藏書，故其利用率之高、讀者對象之廣、人數之多，都不是中央政府藏書或一般的

⁷³(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卷八，〈學規·提學高賁亨十戒〉，頁 10 下。

⁷⁴(明)鄭廷鵠，《白鹿洞志》，卷十二，〈李齡規示諸生八事〉，頁 324。

⁷⁵平雨，〈中國古代書院和出版業〉，《出版參考》，第 22 期(1995.11)，頁 4。

⁷⁶王龍，〈明代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特點〉，《陰山學刊》第 3 期(2011.6)，頁 25。

私家藏書所能媲美的。綜括而言，明代江西的書院藏書十分注重藏書的利用，透過借閱的方式，不但大幅提升圖書的流通量，也打破了古代藏書重藏不重用的習慣。且在此過程中，明代江西書院亦逐漸地積累出豐富的藏書管理經驗，不僅匯集了以往書院藏書管理經驗之大成，也可說是替後來中國近現代學校圖書館的建立，譜下了序曲。

附錄：

梅國書院藏書目錄：⁷⁷

迂史節曰：「志藝文何也？紀載以示訓，而備去也；文藝之論不與焉，匪略也。是故首之聖製，經史諸類附焉，紀其目以示訓也。文以紀事，詩以詠物，各從其類；不者缺焉，不可也，紀其詳，以備考也。雜誌，志遺也，藉藝文以傳者也；而志則終矣。」

御製：《洪武正韻》一部十有六卷、《諸司職掌》一部、《為善陰隲書》一部十卷、《孝順事實書》一部十卷、《易經大全》一部二十二卷、《書經大全》一部二十卷、《詩經大全》一部二十卷、《春秋大全》一部三十五卷、《禮記大全》一部三十八卷、《大學大全》一部二卷、《中庸大全》一部二卷、《論語大全》一部二十卷、《孟子大全》一部十四卷、《性理大全》一部七十卷、《五倫書》一部六十四卷，已上御書共一十五部，俱洪武、永樂間頒降府學。弘治庚申(13年，1500)水毀南康、上猶，二學殘缺；崇義學新立，無頒。

制類：《欽賜大學衍義》一部、《欽降明倫大典》一部、《大明集禮》一部、《存心錄》一部、《洪武正韻》一部、《大明令》一部、《大誥》一部、《大明律》一部、《御製文集》一部、《皇明制書》一部、《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一部、《皇明政要》一部。

經類：《易經註疏》一部、《周易旁註》一部、《周易程傳》一部、《周易本義》一部、《周易纂言》一部、《周易本義啟蒙》一部、《周易本義通釋》一部、《周易傳註》一部、《易經大全》一部、《易圖漏識》一部、《書經註疏》一部、《古三墳書》一部、《書經旁註》一部、《書經傳註》一部、《書經大全》一部、《詩經註疏》一部、《詩經旁註》一部、《詩經傳註》一部、《書經大全》一部、《韓詩外傳》一部、《東萊讀詩紀》一部、《春秋左傳》一部、《春秋公

⁷⁷(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卷24，〈藝文志一〉，頁1上-20上。

羊傳》一部、《春秋穀梁傳》一部、《春秋左傳註疏》一部、《春秋公羊傳註疏》一部、《春秋穀梁傳註疏》一部、《春秋胡傳》一部、《春秋大全》一部、《春秋繁露》一部、《春秋屬辭》一部、《春秋左傳分類》一部、《春秋正傳》一部、《禮記註疏》一部、《禮記集說》一部、《禮記纂言》一部、《禮記大全》一部、《五經正文》一部、《六經篆文》一部、《六經正誤》一部、《論語註疏》一部、《孟子註疏》一部、《孝經註疏》一部、《爾雅》一部、《爾雅註疏》一部、《周禮》一部、《周禮註疏》一部、《周禮集說》一部、《儀禮註疏》一部、《儀禮經傳》一部、《二禮經傳測》一部、《三禮考註》一部、《孔子家語》一部、《四書通義》一部、《四書傳註》一部、《四書或問》一部。

史類：《國語》一部、《戰國策》一部、《史記》一部、《西漢書》一部、《東漢書》一部、《三國志》一部、《晉書》一部、《宋書》一部、《南齊書》一部、《梁書》一部、《陳書》一部、《魏書》一部、《北齊書》一部、《周書》一部、《隋書》一部、《南史》一部、《北史》一部、《舊唐書》一部、《唐書》一部、《五代史》一部、《宋史》一部、《遼史》一部、《金史》一部、《元史》一部、《漢紀》一部、《後漢紀》一部、《元經薛氏傳》一部、《資治通鑑》一部、《通鑑前編》一部、《資治通鑑外紀》一部、《通鑑紀事本末》一部、《通鑑綱目》一部、《古史》一部、《大事記》一部、《大事記解題》一部、《兩漢詔令》一部、《通鑑續編》一部、《兩漢博聞》一部、《蜀漢本末》一部、《十七史詳節》一部、《貞觀政要》一部、《唐鑑》一部、《通志》一部、《綱目前編》一部、《續通鑑綱目》一部、《通鑑節要》一部、《史通》一部、《歷代通鑑纂要》一部、《史鈔》一部、《金佗粹編》一部、《春秋列傳》一部、《邵氏聞見錄》一部、《路史》一部、《世史正綱》一部、《遵堯錄》一部、《世史正綱》一部、⁷⁸《讀史管見》一部、《馬班異同》一部、《小學史斷》一部、《杜氏通典》一部、《唐六典》一部、《漢雋》一部。

子類：《鬻子》一部、《老子》一部、《列子》一部、《莊子》一部、《三子口義》一部、《鶡冠子》一部、《亢倉子》一部、《關尹子》一部、《素書》一部、《子華子》一部、《荀子》一部、《管子》一部、《韓非子》一部、《尹文子》一部、《鄧析子》一部、⁷⁹《公孫龍子》一部、《淮南子》一部、《賈誼新書》

⁷⁸此書重複著錄，或板本不同，或為疏忽，或其他原因，不得而知。

⁷⁹應是《鄧析子》。

一部、《揚子法言》一部、⁸⁰《太玄經》一部、《劉向說苑》一部、《潛夫論》一部、《徐幹中論》一部、《孔叢子》一部、《文中子》一部、《抱朴子》一部、《化書》一部、《孫子》一部、《五子書》一部、《尉繚子》一部。

類書類：《藝文類聚》一部、《初學記》一部、《白孔六帖》一部、《太平御覽》一部、《冊府元龜》一部、《玉海》一部、《事類賦》一部、《皇朝類苑》一部、《群書集事》一部、《文獻通考》一部、《事文類聚》一部、《百川學海》一部、《說郛》一部、《山堂考索》一部、《黃氏日抄》一部、《類說》一部、《苕溪叢話》一部、《野客叢書》一部、《東軒筆錄》一部、《容齋隨筆》一部、《耕讀餘覽》一部、《翰墨全書》一部、……《屏山集》一部、《真西山讀書記》一部、《陸象山集》一部、《慈湖遺書》一部、《正學類編》一部、《大學衍義》一部、《聖學心法》一部、《聖學格物通》一部、《大學衍義補》一部、《困學紀聞》一部、《大學衍義纂要》一部、《禮經會元》一部、《論衡》一部、《薛文清公讀書錄》一部、《經濟文衡》一部、《武經總要》一部、《胡敬齋居業錄》一部。

文類：《文選》一部、《古文苑》一部、《文心雕龍》一部、《文粹》一部、《文苑英華》一部、《兩漢文類》一部(節編集)、《文鑑》一部、《三國文類》一部、《國朝文類》一部、《兩漢文鑑》一部、《文選備遺》一部、《文章類選》一部、《皇明文衡》一部、《文章正宗》一部、《續文章正宗》一部、《文章辨體》一部、《廣文選》一部、《崇古文訣》一部、《秦漢文》一部、《兩漢書疏》一部、《三蘇文粹》一部、《文則》一部、《文式》一部、《文斷》一部、《文章軌範》一部、⁸¹《古文會編》一部、《藝苑菁莪》一部、《文話》一部。

奏議類：《歷代名臣奏議》一部、《宣公奏議》一部、《皇朝名臣奏議》一部、《包公奏議》一部、《李忠定公奏議》一部、《宋史奏疏撮要》一部。

詩賦類：《楚辭》一部、《古賦辨體》一部、《陳思王集》一部、《阮步兵集》一部、⁸²《漢魏詩》一部、《選詩》一部、《鮑明遠集》一部、《唐詩正聲》一部、《唐音》一部、《詩品》一部、《唐詩品彙》一部、《雅頌正音》一部、《詩話》一部、《唐詩紀事》一部、《唐諸家詩》一部、《唐宋名賢詞》一部、《唐

⁸⁰應是《揚子法言》。

⁸¹應是《文章軌範》。

⁸²應是《阮步兵集》。

詩正體》一部、《樂府詩集》一部、《唐詩絕句》一部、《陶靖節集》一部、《陸謝詩集》一部、《陳子昂集》一部、《嵇叔夜集》一部、《李元賓集》一部、《劉長卿集》一部、《岑嘉州集》一部、《駱賓王集》一部、《李翰林集》一部、《韋蘇州集》一部、《李長吉集》一部、《杜工部集》一部、《皇明風雅》一部、《孟浩然集》一部、《白樂天集》一部、《四詩正體》一部、《山谷詩集》一部、《陸放翁集》一部、《高太史集》一部、《陳后山集》一部、《白沙詩集》一部、《東里詩集》一部、《熊士選集》一部、《澄江詩集》一部、《太白山人集》一部、《鄭少谷集》一部。

集類：《蔡中郎集》一部、《郭景純集》一部、《張曲江集》一部、《顏魯公集》一部、《韓昌黎集》一部、《柳柳州集》一部、《李文公集》一部、《皮日休集》一部、《安陽集》一部、《武溪集》一部、《宛陵集》一部、《六一居士集》一部、《南豐類稿》一部、《嘉祐集》一部、《蘇東坡集》一部、《司馬溫公傳家集》一部、《黃山谷集》一部、《擊壤集》一部、《張文潛集》一部、《淮海集》一部、《唐子西集》一部、《徐節孝集》一部、《道卿集》一部、《毘陵集》一部、⁸³《渭南集》一部、《王梅溪集》一部、《陳止齋集》一部、《葉水心集》一部、《陳龍川集》一部、《元遺山集》一部、《文文山集》一部、《道園集》一部、《劉靜修集》一部、《許魯齋集》一部、《吳草廬集》一部、《青陽集》一部、《宋學士集》一部、《王忠文集》一部、《蘇平仲集》一部、《遜志齋集》一部、《解學士集》一部、《吳頤安集》一部、《楊東里集》一部、《王柳菴集》一部、《胡祭酒集》一部、《吳康齋集》一部、《羅一峯集》一部、《尹澄江集》一部、《張東白集》一部、《龍阜文集》一部、《彭文思集》一部、《黃忠宣集》一部、《何椒丘集》一部、《懷麓堂稿》一部、《丘瓊臺集》一部、《吳匏菴集》一部、《類博稿》一部、《楊文懿公集》一部、《王守溪集》一部、《林見素集》一部、《程篁墩集》一部、《學史》一部、《容春堂集》一部、《李空同集》一部、《簡端錄》一部、《何大復集》一部、《甘泉文集》一部、《羅圭峯集》一部、《徐迪公集》一部、《鄭少谷集》一部、《鈐山堂集》一部、《蔡虛齋集》一部。

字書類：《東書堂法帖》一部、《淳化帖》一部、《智永千文帖》一部、《聖

⁸³應是《毘陵集》。

教序帖》一部、《多寶帖》一部、《鍾繇帖》一部、《蘇帖》一部、《許氏說文》一部、《六書統》一部、《六書正譌》一部、《六書本義》一部、《說文字原》一部、《書學正韻》一部、《古今韻會》一部、《宣和書畫譜》一部、《韻府群玉》一部、《玉編》一部、《廣韻》一部、《韻譜》一部、《韻學直音》一部、《篆額》一部、《隸釋》一部、《韻學集成》一部、《千祿字》一部、《鍾鼎篆文》一部、《圖書寶鑑》一部。

志類：《山海經》一部、《水經》一部、《一統志》一部、《江西通志》一部、《河南通志》一部、《四川通志》一部、《山東通志》一部、《廣東通志》一部、《廣西通志》一部、《湖廣通志》一部、《中都志》一部、《姑蘇志》一部、《松江志》一部、《昆陵志》一部、⁸⁴《杭州志》一部、《溫州志》一部、《處州志》一部、《寧波志》一部、《會稽志》一部、《赤城志》一部、《嚴州志》一部、《福州志》一部、《泉州志》一部、《興化志》一部、《漳州志》一部、《邵武志》一部、《吉安志》一部、《臨江志》一部、《瑞州志》一部、《撫州志》一部、《建昌志》一部、《贛州志》一部、《黃州志》一部、《武昌志》一部、《沔陽志》一部、《長沙志》一部、《蒲圻志》一部、《安慶志》一部、《淮揚志》一部、《淮安志》一部、《廬州志》一部、《徐州志》一部、《泗州志》一部、《滁州志》一部、《廣德州志》一部、《赤城會通記》一部、《廣州志》一部、《南雄志》一部、《瓊州志》一部、《雷州志》一部、《濮州志》一部、《丹徒志》一部、《吳縣志》一部、《慈溪志》一部、《新安文獻志》一部、《崖山志》一部、《鉛山志》一部、《德清志》一部、《桐廬志》一部、《孝豐志》一部、《鴈山志》一部、《武夷志》一部、《白鹿洞志》一部、《鎮遠志》一部、《成都志》一部、《重慶志》一部、《雍大記》一部。

雜類：《呂氏春秋》一部、《越絕》一部、《高麗圖經》一部、《太乙書》一部、《觀象玩占》一部、《釋名》一部、《方言》一部、《弘明集》一部、《博古圖》一部、《焦氏易林》一部、《釋道藏經目錄》一部、《天文祥異賦》一部、《道樞》一部、《乾象》一部、《遁甲圖局》一部、《內經素問》一部、《王氏農書》一部、《齊民要術》一部、《天文分野》一部、《三元參贊》一部、《大觀草本》一部、《玉髓經》一部、《地理發微》一部、《地理囊金》一部、《地理正途》一部、《玉機微義》一部、《青囊經》一部、《陰符經》一部、《地理樞要》一部、《步天歌》一部、《參同契》一部、《葬經》一部、《四十二章經》

⁸⁴應是《昆陵志》。

一部、《醫經小學》一部、《靈棋經》一部、《本草集要》一部、《內經素問》一部、《爛柯經》一部、《東垣十書》一部、《欣賞編》一部、《丹溪纂要》一部、《適情錄》一部。

已上俱藏梅國書院內御書樓，用備誦讀考索。⁸⁵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李夢陽，《白鹿洞書院新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周偉等，《白鹿洞書院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臺北：世界書局，1980。
- (明)張自烈，《芑山文集》，《叢書集成續編》18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明)焦竑，《國朝獻徵錄》，《明代傳記叢刊》111，臺北：明文書局，1991。
- (明)費案等，《嘉靖·廣信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5，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黃文鸞等，《正德·新城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6，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劉節，《嘉靖·南安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50，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明)鄭廷鵠，《白鹿洞志》，載白鹿洞書院古志整理委員會主編，《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北京：中華書局，1995。
- (明)黎喆等，《弘治·撫州府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續編》47，上海：上海書店，1990。
- (清)毛德琦，《白鹿書院志》，《續修四庫全書》72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清)張廷玉，《明史》，《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
- (清)趙之謙等，《光緒·江西通志》，《中國省志彙編》4，臺北：華文書局，1967。
- (清)蕭玉春等，《同治·永新縣志》，臺北：江西永新旅台同鄉文獻委員會，1976。

二、近人論著

⁸⁵本書目之類例，乃當時梅國書院的私家分類，許多書籍的類目可能未盡合適，特請讀者留意。

(一)專書

何東紅、朱賽虹，《中國官府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李才棟，《江西古代書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陳榮華、陳柏泉、何友良，《江西歷代人物辭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

趙連穩，《中國書院藏書》，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鄧洪波，《中國書院章程》，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00。

(二)期刊論文

文革紅，〈江西小說刊刻地--「雲林」考〉，《明清小說研究》第1期(2010.2)，頁212-219。

文毅，〈明代私人藏書興旺原因及特徵〉，《黔南民族師專學報》第2期(1999.3)，頁98-102。

王安春，〈明代江西廣信府的造紙業〉，《上饒師範學院學報》第4期(2001.9)，頁66-71。

王咨臣，〈江西最大的刻書作坊—潯灣書鋪街〉，《江西圖書館學刊》第2期(1992.7)，頁74；81。

王偉凱，〈明代圖書的國內流通〉，《社會科學輯刊》第2期(1996.3)，頁105-109。

王國強，〈中國古代藏書的文化意蘊〉，《圖書與情報》第3期(2003.8)，頁20-24。

王龍，〈明代閱讀活動發展的地域文化特點〉，《陰山學刊》第3期(2011.6)，頁25-29；2。

平雨，〈中國古代書院和出版業〉，《出版參考》，第22期(1995.11)，頁4。

朱黎明，〈略論中國藏書文化的人文主義精神〉，《江西圖書館學刊》第4期(2004.12)，頁83-84。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3)，頁141-176。

胡兆量、黃恩涌、韓茂莉，〈中國人才地理特徵〉，《經濟地理》第1期(1998.3)，頁8-14。

唐朝暉、歐陽光，〈江西文人群與明初詩文格局〉，《學術研究》第4期(2005.4)，頁141-145。

張來芳，〈江西古代藏書家〉，《中國典籍與文化》第2期(1999.5)，頁23-25。

曹國慶，〈明代江西科第世家的崛起及其在地方上的作用〉，《中國文化研